

跟蹤騷擾案件暴力風險因素與評估量表之研析

黃翠紋*

目次

- 壹、前言
- 貳、跟蹤騷擾行為構成要件
- 參、跟蹤騷擾加害人類型
- 肆、跟騷者暴力風險與評估工具
- 伍、結論與建議

摘要

跟蹤騷擾行為自古存在，對被害人人身安全危害甚巨，但國際社會卻直到 1990 年才由美國加州制定全球第一個跟蹤騷擾防制專法，此後擴及到美國各州與其他國家。而在臺灣，雖然「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仍在立法研商中，惟為回應外界殷殷期盼，內政部警政署已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函發「警察機關防制跟蹤騷擾案件實施計畫」，為專法施行預做準備。但值得注意者：跟騷案件與一般暴力案件特性存在諸多差異，為落實專法保護被害人之立法目的，執法策略應與一般犯罪案件有別。

在性別暴力問題防制上，若欲對犯罪者的暴力行為進行風險控管或處遇，必須先掌握加害人特質並研析風險因素與評估工具，才能進行後續風險控管與處遇作為。然而對照國際社會有關跟騷案件風險評估工具之研究與實務運用的蓬勃發展，臺灣有關跟騷案件風險評估工具及執法策略之研究極為欠缺。本文將分別針對跟蹤騷擾行為構成要件、跟騷者類型、跟騷者暴力風險與評估工具建構之初探，以及跟騷案件執法策略等議題進行探討，提供實務機關處理此類案件之參考。

關鍵詞：跟蹤騷擾防制法、跟蹤騷擾案件、暴力風險因素、風險評估工具

* 本文作者黃翠紋，現職為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教授。

A Study on the Violence Risk Factors and Risk Assessment Tools of Stalking Cases

Tsui-Wen Huang*

Abstract

Stalking has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s, it has been a great hazard to the personal safety of victims.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1990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mulated the world's first law on stalking prevention in California, which has since expanded to US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aiwan, the draft of "Anti-Stalking Law" is still under legislative research. However, in response to expectations from the society,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of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ssued "The Anti-Stalking Police Program" on June 14, 2019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pecial law.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lking cases and general violence cases. In order to fulfill legislative purpose of protecting victims by the special law, law enforcement strategy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strategy for general crimes.

In the prevention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if we want to control or deal with the offender's violence, we must first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petrators,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and assessment tools, before we conduct subsequent risk control and treatment programs. However, in ligh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s vigorous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tools for stalking cases, Taiwan's research on risk assessment tools and law enforcement strategies for stalking are extremely lacking.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The elements of stalking behavior, types of stalkers, assessment tools for violence risk of stalkers, and law enforcement strategies will be explored in this paper. The

* *****

author wish to deliver some advices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deal with such cases.

Key Words: Anti-Stalking Law, Stalking Case, Violence Risk Factors, Risk Assessment Tool

壹、前言

「免於遭受犯罪侵害」是最基本的人權保障。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人身安全領域中的美好生活指數，亦著眼於探討犯罪被害對幸福感的影響及其衡量指標(黃翠紋, 2013)。而在眾多人身安全危害行為中，雖然跟蹤騷擾行為(stalking)¹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全球性社會問題，但危害不僅長期被忽視，而且由於案件複雜性較一般暴力犯罪高，導致人們對其特性與防制作為研究，較其他性別暴力類型晚。跟騷行為可能造成被害人日常生活秩序嚴重破壞，為躲避加害人糾纏，可能改變他們的電話號碼和日常生活、減少人際互動、失去工作或尋找其他工作，甚至改變他們的外表和/或姓名，讓被害人感到身心俱疲、無處容身。同時，估計至少約有2%的被害人遭跟騷者殺害(Baum et al, 2009; Melton, 2007)。

van der Aa 與 Römken (2013) 綜合前人調查研究發現，受到跟騷行為影響的人口盛行率，估計約佔總人口的4.5%至23.4%之間，對被害人心理、社會和職業功能均可能有不良影響，但此類案件卻具有非常高的犯罪黑數，只有1/2至1/3的被害人報案。而根據英格蘭和威爾斯在2016年的犯罪被害調查顯示，於調查前一年有4.9%女性和2.4%男性有被跟騷經驗(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6)。在美國，根據Black等人(2011)研究顯示，大約1/6女性在生命某個階段曾遭到跟騷，其中有2/3女性被害人和1/4男性被害人被前親密伴侶跟騷。而McFarlane等人(1999)以遭殺害的女性被害人為研究對象則發現，有76%被害人在兇殺案發生前1年遭到加害人跟騷。此外，Spitzberg與Cupach(2007)綜合前人研究發現，大約有30%至40%的跟騷案件有暴力攻擊，被害人除因遭受攻擊而導致身體傷害外，還可能遭受與跟騷行為相關的心理傷害。至於在臺灣，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調查顯示，大約每4位民眾就有1位(24.2%)曾被科技跟蹤或監控，其中女性被害人所佔比率為78.4%(楊綿傑, 2019)。

雖然跟騷行為自古希臘和羅馬時代就存在，也曾出現在莎士比亞等各種著名文學作品中，但直到1989年7月18日，美國好萊塢演員Rebecca Schaefer慘遭瘋狂粉絲Robert John Bardo殺害，才讓世人關注此類性別暴力

¹ 「stalking」一詞，可譯為糾纏、纏擾、跟蹤騷擾等用語。2018年在立法院法案二讀的各黨團所送版本，主要有二個法案名稱「跟蹤騷擾防制法」與「糾纏行為防制法」。雖然迄今本法尚未三讀通過，但以最新立法進度似乎以「跟蹤騷擾防制法」為法案名稱的可能性較高，而內政部警政署於2019年6月14日函發「警察機關防制跟蹤騷擾案件實施計畫」，亦以「跟蹤騷擾」稱之，因此在本文的標題乃使用「跟蹤騷擾案件」一詞，或簡稱「跟騷行為」；而有關「跟騷行為加害人」則多簡稱為「跟騷者」，合予敘明。

案件。在案發前，Robert 已經跟騷她長達 4 年時間，此一不幸案件受到媒體高度關注。不僅如此，加州在同一年發生另外 4 名婦女因遭前夫或前男友騷擾和威脅，卻在向警察報案後遭到殺害的重大案件，乃促使加州在 1990 年制定全球第一個跟騷防制專法 (David, 2018)。此立法行動在不到 3 年內，擴及美國的 50 個州以及哥倫比亞特區接續制定跟騷防制法，日後，澳洲、紐西蘭、加拿大、日本、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也陸續將此種行為犯罪化。其中，英國在 1997 年制定「騷擾防制法」(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是歐洲第一個制定專法的國家 (van der Aa, 2018)。此後，歐洲許多國家也陸續修改刑法，增訂跟騷罪，針對故意、惡意和反覆跟蹤或騷擾並構成威脅被害人的跟騷者予以刑事追訴，以確保被害人或她/他的親友人身安全 (Schlesinger, 2006)。而在鄰近的日本，也早在 2000 年 5 月 18 日即通過「跟蹤纏擾防治法」，於同年 11 月 24 日正式施行；再於 2013 年 7 月 23 日針對電子郵件送信規定進行部分修正，同年 10 月 3 日並增加警察局長可發佈警告令等相關規定 (陳慈幸, 2011)。顯示，將跟騷行為犯罪化是全球傳播最快的立法趨勢之一 (van der Aa & Römkens, 2013)。

而在臺灣，近年亦因陸續發生多起民眾遭跟蹤、騷擾，進而衍生被殺傷或致死案件，引起社會各界對跟騷行為重視，但現行刑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以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等法規雖然對跟蹤、騷擾行為分別定有處罰規定，然這些法律僅就特定關係、與性別有關或跟蹤行為進行規範，其他類型的被害人則無法援引這些法律予以保護，形成法律規範漏洞，亟待填補，因此也倍受婦女團體及立法委員關注。為保護個體免於遭受他人長期跟騷、保障生活秩序並預防人身安全危害事件發生，現代婦女基金會與前立法委員吳志揚先生等人合作提案「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並於 2015 年 7 月一讀通過，此提案嗣後在 2017 年年底併同王育敏、黃昭順、吳志揚、蔣萬安等 21 位立法委員的提案，在立法院進行實體討論與審查 (立法院, 2017)。此外，內政部警政署為填補法律規範漏洞，成立推動立法小組，召開多次研商會議及公聽會，邀請人權與法制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參考日本及德國之立法例，並經行政院會於 2018 年 4 月 19 日通過內政部擬具的「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黃翠紋, 2018)。本草案雖曾於 2018 年 12 月 13 日完成黨團協商通過名稱為「跟蹤騷擾防制法」，但因草案的內容有諸多缺失，內政部警政署擔心若貿然通過將造成執行上的困難，而暫時將草案撤回，刻正研議中，預計將於 2020 年底前送立法院再審。在此過渡期，為回應外界殷殷期盼，內政部警政署乃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函發「警察機關防制跟蹤騷擾案件實施計畫」，律定員警受(處)理本類案件之勤務及偵查作為，並為

本法施行預做準備²。

然而值得注意者，過去研究顯示，大部分被害人縱然向警察報案，仍會持續遭到糾纏，凸顯對跟騷案件進行準確風險評估和有效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McEwan, Harder, Brandt, & de Vogel, 2020)。例如，根據 Rosenfeld (2003) 的研究發現，縱然被害人向警察機關報案，但跟騷者的終生再犯率為 49%，而若是以案發第一年計算，則有 80% 的跟騷者會再犯，顯示跟騷案件具有重複性、延續性、變動性，無法以傳統犯罪案件處理模式介入。因此，不論是就被害人之保護，或是跟騷者暴力風險管理工作之推展，皆有賴對跟騷者特質之瞭解，並需進一步評估影響跟騷者暴力行為或再犯之風險因素，才能施以不同之執法策略與防制方案。在西方社會，自 1970 年代起逐步建構各類暴力犯罪風險評估工具，而鑒於跟騷案件與一般暴力案件特性存在諸多差異，後續亦對跟騷案件制定結構化的篩選評估工具，並進而協助警察以及其他實務工作者識別風險、確認處理優先順序，並能適當的處理跟騷案件。這些經過近 20 年累積的研究，可提供臺灣警察及網絡其他人員介入跟騷案件非常重要的參考。以下本文將分別針對跟蹤騷擾行為構成要件、跟騷者類型、跟騷者暴力風險與評估工具建構之初探，以及跟騷案件執法策略等議題進行探討，做為實務機關處理此類案件之參考。

貳、跟蹤騷擾行為構成要件

跟騷行為經常被定義為：跟騷者對被害人生活進行重複、不受歡迎的入侵模式，使被害人陷入合理的痛苦、憂慮或恐懼 (Mullen, Pathé, & Purcell, 2009)。從法律和行為科學的角度而言，在定義何謂跟騷行為時，會面臨一些獨特的挑戰：首先，與大多數其他犯罪行為不同，跟騷行為的構成要件是：行為具重複性。雖然在認定跟騷行為時，有必要檢查各個單獨的行為，但若沒有綜整跟騷者的所有行為，將無法瞭解行為發生背景。其次，跟騷行為可能包括各式各樣行為，其中某些行為可能是合法的。例如，送禮物、打電話，甚至突然與被害人碰面等行為；甚且在不同情況下 (例如在親密關係中)，某些行為不會被視為非法行為。而有些行為則在本質上很容易即能認定為非法或不適當的行為，例如：擅自闖入被害人住處、尾隨被害人、威脅或恐嚇被害人，以及攻擊被害人 (Fox, Nobles, & Fisher, 2011)。因此，若是單獨檢查這些行為，將無法對跟騷案件的潛在風險進行精準評估。第三，由於跟騷行為具有重複性，有關跟騷案件的定義，多要求重複不必要的行

² 本計畫實施期程係自 2019 年 6 月 14 日起至專法完成立法施行前。

為，並會引起被害人的恐懼或不安。然而「被害人的恐懼或不安」卻因人而異，因此跟騷行為定義的第三個組成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引起爭議。而 Tjaden (2009) 和美國國家刑事司法協會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ssociation, 1993) 則指出，恐懼是使合法行為與犯罪行為區分開的原因。在美國一些司法管轄區，例如阿肯色州 (Arkansas) 和科羅拉多州 (Colorado)，已經擴大恐懼的認定標準，以便能夠含括被害人的情緒困擾；但反對者則認為，一般犯罪的構成要件不需要恐懼此要件，因此在跟騷行為的認定方面，應該也無須含括此要件 (Dietz & Martin, 2007)。為了法律構成要件的明確性、避免過度主觀認定，某些行政區域的法律要求構成要件應該納入「合理的人」(reasonable person) 一詞。在實際審酌案件時，所謂「合理人」的標準是需要評估另一個理性的人，如果置於被害人的處境中，是否會引發同樣的恐懼情緒 (Coupland, 2018)。

由於跟騷法規因各國家或行政區域而有差異，因此跟騷行為在法律上的構成要件也會因司法管轄區而異 (Carter, 2016)，但通常包括三個主要行為要素 (Logan & Walker, 2017; Spitzberg & Cupach, 2014; Logan, 2010; Logan et al., 2006)：

一、行為過程

跟騷行為過程，包括在不同時間發生的兩個以上行為³。有關跟騷行為的研判通常會經由關注特定行為或事件，其中許多行為或事件並非違法，甚至單獨的行為有時表面上看似無害 (Stalking Resource Center, 2018)。事實上，跟騷行為被害人的恐懼和傷害是不斷累積的結果，而不是由單純某個事件所引發。每個事件都可能引發一種影響，導致事件歷史和行為軌跡大於其各部分的總和。與單一的壓力或創傷事件相比，累積的壓力或創傷經歷對個體的影響更為嚴重和持久 (Logan & Walke, 2017)。跟騷行為的累積和慢性

³ 除比利時外，所有歐盟國家有關跟騷行為防制法對跟騷行為的定義都要求必須具備「行為過程」或「重複行為」，而不是單一事件。然而，儘管根據比利時的法律，單一事件就構成跟騷行為，但比利時最高法院已經裁定這種行為需要重複，才能構成跟騷行為，這使得定義上的差異幾乎是形式上的，而在實務判決上，則大多需要此一構成要件。所有法律定義都使用開放或廣義的概念，例如「騷擾」或「追求」，這些概念需要法院進一步解釋。使用廣泛的概念用語是期待能夠含括各種跟騷行為，而若是採行狹義的概念將會排除某些跟騷行為，而讓加害人能夠輕易地規避起訴。但另一方面，使用廣義的概念有時也招來批評。例如，荷蘭在引入新法律之前，議會對行為廣泛定義及其可能對法律確定性原則的侵犯，進行激烈辯論。廣泛的概念可能會引起定義的不確定性，並且反而可能導致實際判例採行非常嚴格的解釋。一些廣義的法定要素，如「定期和持續的騷擾」或「有意恐嚇」，可能不夠具有包容性，至少在執法官員的心目中是這樣。他們可能會嚴格解釋這些條款，只允許對最嚴重的案件進行起訴 (van der Aa & Römken, 2013)。

影響，會干擾被害人各個面向的生活，而瞭解跟騷狀況的輪廓需要評估幾個關鍵面向，包括行為過程、威脅的背景以及被跟騷後果的全部範圍和性質。因此，在評估跟騷行為時必須進行全面性的檢視（Spitzberg & Cupach, 2014; Logan et al., 2006）。

二、引發被害人恐懼或擔心人身安全

跟騷行為不僅包括跟騷者的行為，還包括對被害人的影響。有關跟騷行為法律定義大多強調「被害人感到恐懼（或不安）或對自身人身安全的關注」（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2007）。因此，被害人的心理反應以及被害人因跟騷行為而對其生活型態做出改變，都可以作為跟騷者所引發恐懼（不安）的證據。隨著時間推移，被害人對跟騷行為的恐懼是無處不在。與在其他正常的心理和社會功能背景下發生的單一壓力事件不同，跟騷行為會干擾被害人生活的許多面向。即使是基本和普通的日常生活，也會成為被害人恐懼的來源（Nicol, 2006）。許多國家或行政區域有關跟蹤騷擾防制法使用「合理的人格標準」，亦即：跟騷者的行為是否會導致在類似情況下，合理的人心生害怕？在評估恐懼的合理性時應包括：（一）隱性或顯性威脅；（二）這些威脅的背景，以及（三）被害人的恐懼或擔憂。經由判斷這三個要素，有助於理解為什麼恐懼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累積，並有助於瞭解威脅和恐懼的背景（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2007）。

三、不受歡迎的行為

跟騷行為的另一個構成要件，是行為的不受歡迎，但不一定是對行為的惱怒或厭惡。不受歡迎行為的指標包括：被害人有明確的意思希望跟騷行為能夠停止，因此需要檢查被害人為反抗跟騷者所採取的步驟（被害人阻止能力），以及儘管有採取行動反抗，但跟騷者仍然堅持其行為（跟騷行為持久性）。由於跟騷行為會對被害人產生重大的心理、社會和生活後果，被害人會使用許多不同的策略來應對跟騷行為，其中可能包括：對抗、安撫、否認其正在發生或分散注意力、退縮、與朋友和家人談論，以及採取各種安全措施以調整自己的生活（Sheridan & Lyndon, 2012; Kuehner, Gass & Dressing, 2007; Logan et al, 2006）。

相關研究顯示：被害人應該採取直接、簡潔和明確的方式，讓跟騷者清楚知道其行為不受歡迎，這在確保被害人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步驟。而當跟騷者被告知其行為是不受歡迎後，仍然繼續跟騷行為將是一個重要的危險訊息，而且行為過程的故意部分將更加清晰（Carr et al., 2014; Spitzberg

& Cupach, 2014; Mullen et al., 2006)。與此觀念一致，跟騷者可能會努力減少行為意圖的出現。例如，Malsch、de Keijser和 Debets (2011)發現，他們所研究的許多跟騷者樣本會最小化或找藉口，為什麼他們出現跟騷行為。例如，跟騷者會表示他們與被害人的互動是一次意外，他們會指責被害人，或指控是被害人主動與他們聯繫，他們會否認行為對被害人所造成的傷害。Mumm和 Cupach (2010)的研究發現，被害人若能明確告知跟騷者，他們不想進一步與跟騷者接觸或是被害人能夠採取保護措施減少與跟騷者接觸，確實能夠阻止大部分跟騷者後續不法行為。

參、跟蹤騷擾加害人類型

在對跟騷者行為進行風險評估或制定跟騷防制政策之前，有賴於對跟騷者類型的瞭解。過去近卅年中，已有數個研究小組試圖對跟騷者進行分類。通常，建立跟騷者類型的目標是確認構成跟騷者群體間的差異，而一旦確定群體之間的差異，將可預測諸如暴力、威脅或其他犯罪行為的機率，甚且建立有效的跟騷者類別，可以指導案件風險控管和跟騷者處遇決策。雖然類型學上的區別還沒有發展到足以準確預測跟騷行為的程度，但跟騷者分組之間的區別已開始為風險管理策略提供依據。

早期有關跟騷行為研究認為，多數是由精神病患或色情狂妄想引起的，而且跟騷者因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而有較高比率的暴力風險。因此，最初的分類僅探討精神疾病和非精神疾病跟騷者之間的差異。但晚近研究則發現，相較於非精神病人的跟騷者，患有精神疾病的跟騷者實際上更不會採取暴力攻擊行為。甚至有一些研究發現，患有人格障礙的跟騷者最有可能對被害人施加暴力 (Rosenfeld, 2003)。而此種發現是合理的，因為前者比後者有更大的機會與被害人進行互動，而隨著跟騷者類型化研究的進展發現，大多數跟騷者從事跟騷行為時並不是受到精神疾病所影響。因而研究者將重點轉移到跟騷者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 (Racine & Billick, 2014; Kienlen et al., 1997)。此外，學者亦注意到，跟騷行為發生的背景以及此類行為背後的動機是重要的預測變項。本文回顧迄今為止，開發的數種最具影響力和最廣為人知的跟騷者類型，臚列如下。

一、Zona 的跟騷者與被害人關係類型

第一個以跟騷者和被害人之間關係進行分類的研究是由 Zona、Sharma 和 Lane (1993) 等人所提出。Zona 等人在洛杉磯警察局專門處理跟騷案件的

部門工作，他們以跟騷者與被害人關係對跟騷案件進行分類，而將跟騷者分為四類 (Racine & Billick, 2014; Sheridan & Davies, 2001)：(一)單純的痴迷 (Simple obsessional stalker)：此類案件是跟騷者和被害人彼此有一些互動關係，其間的關係可能是在工作環境(雇主-僱員)、醫療環境(醫生-患者)背景下，或者可能具有親密關係。根據定義，儘管這些個案不一定是以曾有親密關係為限，但其中大多數係屬於前親密伴侶關係。跟騷者的動機係強迫被害人能夠回到過去的親密關係中，或是因為被害人單方面終止關係而進行報復。由於跟騷者接觸到被害人的障礙較少，因此這些案件極有可能導致暴力事件。此類型的跟騷者所佔比率最高，有半數跟騷者屬於此種類型。(二)愛戀痴迷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愛戀跟騷情況是跟騷者和被害人沒有先前的互動關係，此類跟騷被害人通常是名人，跟騷者被稱為典型的「痴迷者」，實施此類行為的跟騷者通常具有某些精神疾病，例如知覺失調症或情感障礙。此類型跟騷者透過媒體或公共場所見到被害人後，開始對被害人產生癡迷，而跟騷者也可能會對被害人施加暴力。此類型跟騷者所佔比率約占三成。(三)色情狂 (Erotomaniac stalker)：當跟騷者妄想被害人愛上她/他時，就會發生色情狂的跟騷行為。這類跟騷者是 Zona 分類系統中最少見的跟騷者，通常是年輕女性，而被害人則通常是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男性。此類型的跟騷者所佔比率約只佔一成。(四)假被害症候群 (false victimization syndrome)：有少數情況(2%)是某人謊稱他/她是被害人，其動機可能是為引起注意或企圖報復被指控的跟騷者。

二、Mullen 等人的跟騷者類型

Mullen、Pathe、Purcell 和 Stuart (1999) 對 145 個由法院轉介到精神療養院的跟騷者進行分類。他們擴展前人的分類系統，除分析跟騷行為外，並加入跟騷的動機和跟騷行為的背景等變項。他們將跟騷者區分成五種類型，但這些分組並非相互排斥，而且某些跟騷者可能同時符合多個分組的特徵：(一)被拒絕跟騷者 (Rejected stalker)：此類跟騷者會犯下跟騷行為是期待過去與其有親密關係的被害人恢復關係或施加報復，此類跟騷者所佔比率最高而且大多數是男性，也是最有可能對被害人施暴者。(二)尋求親密關係者 (Intimacy seeker)：此類跟騷者企圖與被害人建立浪漫的親密關係，但現實關係則通常不一定如此；此類跟騷者包括病態癡情和性妄想；此類跟騷者通常是社會孤立、低社交能力，也可能是精神病人。(三)無能為力的追求者 (Incompetent suitor)：此類別的跟騷者與尋求親密關係的群體有些重疊，但是該群體的獨特之處在於：對被害人缺乏情感互惠的認知，跟騷的動機是

權控被害人。(四)怨恨跟騷者(Resentful stalker)：此類跟騷行為是跟騷者因被害人的行為造成傷害或有誤解，他們很可能會威脅被害人，意圖引起恐懼，從而賦予跟騷者控制感。和(五)掠奪性跟騷者(Predatory stalker)：此類跟騷者所佔比率最低，他們幾乎都是男性，其中大多數人都有犯罪記錄，以被害人為目標的目的通常是具有性意圖的騷擾或攻擊。而後續 Mullen、Pathe 和 Purcell (2001) 以及 Mullen 等人(2006)有關跟騷者的研究，持續依循此種分類方法。

三、Holmes 跟騷者類型

Holmes (2001) 將跟騷者的類型分為 6 類，包括：(一)性慾跟騷者(Sexually driven stalker)：此類跟騷者追求女性並與她們發生性關係，而被害人有時是自願，有時則是遭強迫。(二)單戀愛情跟騷者(Unrequited love stalker)：此類跟騷者持續困擾愛慕的對象，雖然被害人很堅定地拒絕他/她的追求，但跟騷者仍不放棄。(三)復仇的跟騷者(Rejected revenge-seeking stalker)：此類跟騷者對於被害人拒絕持續與其維持親密關係感到憤怒，並發誓復仇，認為「她怎麼敢甩我！我將讓她有一個永遠不會忘記的教訓。」(四)名人跟騷者(Celebrity stalker)：跟騷者糾纏的對象是名人。有些跟騷者可能會誤認名人愛上他，而對被害人窮追不捨；但也有跟騷者認為此位名人的存在阻礙他的發展，以至於憎恨被害人的存在。(五)政治跟騷者(Political stalker)：驅使此類跟騷者行為的動機是憤怒的情緒，他們可能會威脅並可能攻擊政治人物。但另一個政治的子類型，則是當政治人物受歡迎的程度超過其實際施政的績效，那麼跟騷者通常是對這些名人有瘋狂的支持度並成為跟騷者。(六)職業契約殺手(Professional contract killer)：此類跟騷者是職業殺手，其行為動機是出於利益，因此嚴格而言，此類跟騷者屬非典型的跟騷者。

四、Sheridan 和 Boon 的跟騷者類型

Sheridan 和 Boon (2002) 所提出的跟騷者類型，是專門為警察機關開發的，包括：(一)跟騷前配偶或伴侶者(Stalking by a former spouse or partner)：其行為特徵是對被害人辱罵、毀損財產和/或施加身體暴力等行為。(二)以愛情為目的跟騷者(Stalking based on love)：此類被害人與跟騷者關係通常為陌生人或不熟識，而不是分手的前伴侶關係，因此他們遭受暴力的威脅可能性較低。(三)妄想型跟騷者(Stalking based on delusional fixation)：跟騷者幻想與被害人「具有特殊關係」，並且認為只要堅持不懈

的追求，他與被害人在一起只是時間上的問題。此類被害人與跟騷者的關係通常為陌生或不熟識，而且被害人以名人所佔比率最高。(四)虐待狂跟騷者(Sadistic stalkers)：此類跟騷者從恐嚇被害人過程獲得快樂並尋求權力控制，對被害人有很高的暴力危險性。

五、跟騷者的 RECON 類型

Mohandie、Meloy、McGowan 和 Williams (2006) 根據 1005 件跟騷案開發 RECON 分類系統，從兩個關鍵領域將跟騷者分為四類：(一)跟騷者與被害人之間先前關係的性質(關係, RE)，以及(二)這種關係所發生的背景(脈絡, CON)可作為跟騷者不同類別的預測，尤其是預測暴力行為的風險。根據他們的分類方案，過去與被害人有關係者屬第 I 型，包括與跟騷者有親密關係或熟識者，而第 II 型被害人則是公眾人物或陌生人。

第 I 型跟騷者有二類，其中與被害人具有親密關係者(包括現有或曾有婚姻關係者、男女朋友)，所佔比率最高(50%)，也是最危險、最有可能對被害人施加暴力、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器、有自殺行為或意念、酗酒或吸毒的跟騷者，而且以男性所佔比率最高。儘管被害人已經申請保護令，曾經遭警察逮捕或遭法院羈押或採行其他法律威嚇作為，但跟騷者再犯的情形卻相當普遍。另一類跟騷案件兩造關係為認識者，但他們的關係沒有涉及親密伴侶關係或性關係。兩造關係型態，包括工作和其他專業關係，非親密的友誼以及臨床醫生與患者的互動。熟人跟騷者通常會強烈希望與被害人建立關係，而追求模式有時會持續數年。儘管被害人不像親密伴侶者那樣容易遭受暴力，但仍有多達 1/3 的熟人跟騷者最後發生攻擊被害人情形(Mullen et al., 1999)。

第 II 型跟騷者是由與被害人沒有接觸或僅有偶然接觸者組成。在過去相關研究中，他們所佔比率介於 1/3 至 1/2，但由於跟騷者的行為未必曝光或轉變成犯罪活動而無法被識別，因此可能存在數量龐大的犯罪黑數。對公眾人物實施跟騷者有比較大的比率是精神病人、女性，而被害人則以男性所佔比率較高。雖然名人因遭到跟騷肇生暴力通常會引起媒體關注，但實際上只有很少數的跟騷者會採取實際行動威脅名人或施加暴力。另一類的被害人不是公眾人物，他們在跟騷行為發生前與跟騷者是不熟識關係，此類跟騷案件所佔比率最少，主要係由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男性所組成，雖然此類跟騷案件很少見，但卻有高達 1/3 的跟騷者以某種行為對被害人施加暴力或破壞財產(Racine & Billick, 2014)。

六、陳慈幸的跟騷者類型

中文文獻對跟騷者類型的分類部分，迄今尚無學者針對國內的跟騷者進行分類，惟陳慈幸教授(2011)以日本的跟騷案件為對象，將跟騷者分為以下四類：(一)因愛戀、感情方面之破滅或瑕疵所產生的報復型跟騷者：數量約佔61%，是最為普遍的跟騷類型。(二)精神病態(自我妄想)型跟騷者：此種類型跟騷者數量最少，約佔2%，然而實務認定此類跟騷者行為多可歸為犯罪，為高危險性之類型。(三)迷戀偶像型跟騷者：此類型跟騷者約佔32%，然而需注意的是，此類型中「偶像」定義並非單指偶像藝人，泛指工作職場、學校等環境中，特別是性別比例有極端差異之團體環境中表現優異者。(四)職業型跟騷者：此類型跟騷者所佔比率为5%，主要指狗仔隊、討債公司等，跟騷者的目的多以賺取利益為目的而行使跟騷行為，故較之前述類型跟騷者，目的較為明確。

綜合前述分類可以發現，跟騷行為的態樣非常多樣，並由各種類型的跟騷者所組成。前述分類僅係為方便識別跟騷者，透過類型化標示危險性，便於進行風險評估與控管。然而過去有關跟騷者類型的相關研究文獻，並未統一跟騷者類型，甚且可以發現：前述各類型有重疊的現象，而且即使在前述的特定類型中，某個跟騷者也可能滿足其他類別跟騷者的定義。例如，根據RECON類型，Zona的戀愛痴迷者大體上歸為第II型跟騷者，這一類別既包括公眾人物也包括陌生的跟騷者(Racine & Billick, 2014)。而Miller(2012)則根據前述多數學者的分類，認為跟騷者有共通的基本類型，包括：一、為了獲得新的關係而跟騷被害人；二、前親密關係被拒絕而進行跟騷，其目的是恐嚇、騷擾、脅迫和/或懲罰被害人；三、跟騷者動機是權力控制，屬於掠奪性的跟騷者。此類型被害人有幾個重疊的類別，包括愛情癡迷者和愛情狂熱者(Zona et al., 1993)、親密關係尋求者但卻無能力的追求者(Mullen et al., 1999; 2000; 2006)、單戀的愛情和名人跟騷者或是某些類型的政治跟騷者(Holmes, 2001)，以及以愛情妄想為目的的跟騷者(Sheridan & Boon, 2002)。此類型跟騷者的首要目的，是想獲得被害人的愛或關注，但如果不斷遭到拒絕，跟騷者可能會轉變為第二型跟騷者。四、其他類別：這些跟騷者包括那些非典型或不能真正代表跟騷者心理動態的類型，例如假被害人症候群、職業殺手和某些類型的政治跟騷者。

在過去20餘年中，經由學者對跟騷者的分類，讓吾人瞭解到哪些類別的跟騷者最有可能實施暴力行為。更重要者，正如對跟騷者進行分類的早期研究所指出：被害人與跟騷者關係預示潛在的暴力行為，曾與跟騷者有親密關係的被害人遭受暴力攻擊風險比其他類型要高得多。在英國的研究，這種

跟騷情況中有 70% 發生暴力攻擊，而被害人是陌生人或相識的案件中只有 27% 發生暴力 (Racine & Billick, 2014)。而 Tjaden 和 Thoennes (1997) 在美國所進行的大型社區調查則發現，有 81% 的跟騷者在跟騷過程中與被害人有近距離接觸。

肆、跟騷者暴力風險與評估工具

「風險評估」係指：一種識別和研究危害的方法，目的是降低危害發生的可能性。而暴力風險評估目的，除可確認個人未來實施暴力行為的風險，並可制定干預措施來管理或降低此種風險 (Coupland, 2018)。跟騷案件具有以下性質，使其與其他形式暴力風險評估不同 (Kropp, Hart, Lyon, & Storey, 2011; Kropp, Hart, & Lyon, 2002)：一、跟騷行為是針對特定個人的暴力行為，不像其他暴力係以特定群體為被害人(如，親密伴侶、兒童)，或沒有以特定對象為施暴對象的暴力。二、不像其他形式暴力行為，跟騷行為不一定有暴力衝突，其行為態樣或目的可能只會讓被害人心生畏懼。三、跟騷行為模式可能持續多年，並且可能包括多種行為。由於跟騷者、被害人和跟騷行為特徵多樣性，導致跟騷暴力風險評估內容也必須多樣化 (McEwan, Daffern, MacKenzie, & Ogloff, 2017)。跟騷案件的異質性意味著：精算風險評估方法不太可行或有效，有關跟騷案件風險評估工具較適宜採用結構化專業評估 (structured professional judgment, SPJ) 方法進行風險評估 (Kropp & Cook, 2014)。這種方法可以根據跟騷案件的特性，制定低、中或高的風險等級，後續再根據案件風險等級制定管理策略與處遇計畫。使用這種方法對跟騷案件進行風險評估有兩個顯著的好處 (McEwan, Pathe, & Ogloff, 2011)：一、由於跟騷案件的複雜性，在實際評估層面它具有靈活性，可以隨著案件的動態情形進行調整。二、在概念層面，相對於其他暴力案件，有關跟騷案件的研究還在進行，而且可能會因為文化而有所差異，此類工具可以搭配跟騷風險研究文獻發現或區域文化的差異而修改。

一、性別暴力風險評估之沿革

自 1970 年代以來，對犯罪者的風險評估在刑事司法和矯治領域有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評估方法也逐步改變。迄今，用於確認暴力和性犯罪者的風險評估工具，大體可以區分成三個階段的變革：(一)非結構化的臨床方法 (Unstructured clinical approach)：此種評估方法是對犯罪者可能構成的風險水平之猜測或預感，其優勢是具有靈活性，評估人員不受特定框架

約束，而且可對犯罪者的行為進行詳細的分析，並針對個人和具體情況制定風險管理和暴力預防策略。而其缺點則是評估者根據個案資料、個案會議或專業經驗做出判斷，但沒有相關的風險因素可以參考，無法確保所有專業人員的判斷都一致，因此這種方法評估的信、效度頗具爭議(Harris & Hanson, 2010; Douglas & Kropp, 2002)。(二)精算風險評估工具(Actuarial Risk Assessment Tool)：精算評估是對犯罪者再犯的可能因素進行客觀評估。透過精算預測，可以將犯罪者按照風險等級進行低、中和高再犯風險的分類。這種分類方法的工作原理，是針對受評估者(犯罪者)所具有與再犯有關的特定背景因素進行分析，並據以估計受評估對象再犯的風險等級。使用該工具的好處是：評估人員可以根據固定和明確的規則做出有關風險的決策，但其缺點則是無法很精確地適用到每一個受評估的個案，其結果只能表示受評估者所具有的特性可能與再犯具有關聯性，但無法清楚說明其因果關係(Taylor & Quayle, 2003)。此時期所評估的風險因子屬於靜態風險因素，例如，精神醫學專業人員用於評估成年男性性犯罪者再犯風險的《Static-99》(靜態99)評估表，主要是評估個案的靜態或歷史風險因素，包括年齡、性別、是否有酒精或毒品成癮問題、前科素行、精神健康狀態因素等10個項目(Jackson & Hess, 2007)。(三)識別「犯罪需求」(Criminogenic Needs)或「動態風險因素」(Dynamic Risk Factors)：第三代風險評估是透過系統化確認與案件相關的風險因素，確認受評估者的犯罪需求或動態風險因素，可以制定管理策略以防止暴力(Douglas & Kropp, 2002)。Hanson等人(2007)指出：「穩定」動態風險因素是與性再犯有關的個人技能缺陷、性偏好行為，但可以透過治療干預的過程來改變；至於「急性」風險因素則屬於高度短暫的狀況，雖然只持續數小時或數天，但這些因素會迅速改變受評估者的環境和人際關係狀況而帶來壓力。其中，《Stable-2007》評估了13個動態風險因素，包括重大的社會影響力、建立穩定關係的能力、對兒童的情感認同能力、對女性的敵意態度、社會孤立、對他人的關心能力、衝動控制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負面情緒狀態、性關注度、利用性作為處理壓力的方法、異常的性偏好以及與監控者的合作關係等(Casey, Day, Vess & Ward, 2013)。使用此工具的好處是，它為評估人員提供有關如何解釋訊息的清晰指引，然而風險和需求評估不是100%準確，因此所進行的評估只能被視為建議性而非強制性，而且需由受過訓練的人員來進行評估(James, 2015)。

晚近在性別暴力風險評估領域，多使用結構專業判斷(Structure Professional Judgment)風險評估方法。此類風險評估工具可以為使用者提供具有臨床意義的評估並建議後續治療的目標。然而使用此種方法的缺點在於它很耗時，並且可能出現使用上的偏差(Hart, Kropp, & Laws, 2003)。其

中，較常被提及的評估工具包括：(一)《性暴力風險協議》(Risk of Sexual Violence Protocol, RSVP, RSVP)：是一種結構化專業評估工具，可提供風險評估程序和內容的指南，包括如何進行風險評估，以及應該評估哪些風險因素，其內容可分類為：性犯罪情形、心理適應情形、未來處遇計劃和其他應考慮因素(Sutherland et al., 2012)。(二)《暴力風險評估量表》(Violence Risk Scale Assessment, VRS)：是一種綜合性的精算工具，涵蓋大多數常見的暴力預測因素。由於再犯風險具有波動性，本評估工具包括靜態(歷史)和動態(可變)風險因素，而且動態因素也可以用於對犯罪者的處遇和風險管理作為之參考。經過驗證，其與犯罪者日後再犯暴力行為的關聯度，具有中到高的關係(Craig, Beech, & Harkins, 2009)。(三)《親密關係暴力風險評估》(Spousal Assault Risk Assessment, SARA)：是由Kropp、Hart、Webster和Eaves等學者所制定的一套結構化的專業準則，用於評估親密關係暴力的風險，其內容涵蓋四個風險因素領域：犯罪者犯罪史、社會心理適應情形、親密關係暴力史和目前的犯罪行為。為協助評估人員做出最終風險判斷，本工具提供兩個估計值：一種是計算風險行為的數量，另一種是計算風險因子的數量(Kropp & Hart, 2000)。(四)《HCR-20》(The Historical, Clinical, Risk Management-20, HCR-20)：是一套結構化的專業評估準則，涵蓋與一般暴力相關的三類風險因素領域：歷史(過去)，臨床(現在)和風險管理(未來)。Douglas、Hart、Webster、Belfrage、Guy和Wilson(2015)指出，HCR-20已在許多國家使用，並獲得廣泛的驗證，是現有評估暴力風險最準確的工具之一，它可用於評估男性和女性，以及住院和門診患者，而根據HCR-20結果做出的結構性判斷與隨後的暴力，具有中等以上的關係。

至於在臺灣，有關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風險評估工作之執行上，內政部家防會(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前身)體察犯罪預測與風險評估，在家庭暴力事件再犯預防之重要性，除引進DA量表外，並於2005年推動「家庭暴力案件危險分級管理試辦方案」，選定嘉義縣市、基隆市、宜蘭縣及高雄市(小港區)為試辦單位。而為進一步建構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並自2009年6月起開始推動「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實施計畫。同時，DA量表日後並由衛生福利部委託王珮玲教授修訂為《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在各縣市廣為適用至今。然而本量表僅適用於親密關係暴力案件，且僅宜用於評估男性加害人的暴力風險(黃翠紋、孟維德，2016；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2010)。而在性侵犯風險評估方面，沈勝昂教授(2006)也曾接受內政部三年期委託研究，經由追蹤假釋性侵加害人參與社區處遇的過程，由心理治療者與觀護人對假釋之加害人進行再犯危險評估工具的評估。而該研究所使用的評估工具，則是國際社會所廣泛使用的《static-99》。

然而對照國際社會有關性別暴力風險評估工具之研究與實務運用的蓬勃發展，臺灣迄今尚未有跟騷案件風險評估工具之開發，有賴主管機關之重視與研究。

二、跟騷暴力風險因素與評估工具

過去有關跟騷行為風險因素的研究，最常見者包括：兩造關係、遭到拒絕的類型，以及跟騷者是否使用暴力威脅手段、是否有毒癮、暴力史、犯罪史、精神狀態、家庭暴力史、人格障礙、是否有報復動機和跟騷行為類型等。但其中，除了暴力威脅手段、兩造關係和跟騷行為類型這三項因素獲得最多研究支持外，其他風險因素的支持程度不一（McEwan, Daffern, MacKenzie, & Ogloff, 2017; Spitzberg & Cupach, 2014; Churcher & Nesca, 2013; Thompson, Dennison, & Stewart, 2013; McEwan, MacKenzie, Mullen, & James, 2012; McEwan, Mullen, MacKenzie, & Ogloff, 2009）。而這些因素多屬靜態因素。然而跟騷行為的特性是動態的，其後續進展受到被害人的反應、生活事件和其他背景因素影響。為了更準確瞭解跟騷行為的成因和再犯/暴力風險，在評估案件風險時，除瞭解跟騷者個人的歷史和靜態風險因素外，也須考慮動態的情境因素，經由評估構成暴力風險的可能因素，才能進行後續的處遇作為（Logan & Walker, 2017; McEwan, Pathe, & Ogloff, 2011）。具體而言，在進行風險評估時需要關注動態情境因素的原因包括（McEwan et al., 2018; Logan & Walker, 2017）：（一）跟騷行為通常發生在兩造認識的情況下，跟騷者的行為目的經常是為了引起被害人的某種反應或對被害人產生某種影響，而被害人的反應方式以及跟騷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影響，則可能會影響跟騷者後續的反應，並可能觸發危險的升級。（二）跟騷行為是動態的，因此跟騷行為和動機會隨環境因素、跟騷者工作或生活狀況，甚至會視被害人的因素而改變，例如當被害人有了新戀情，將可能促發暴力風險升級。（三）動態情境因素與跟騷者人格或其他靜態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可能使風險等級產生變化。

由於跟騷行為與一般暴力特性存在諸多差異，因此跟騷案件風險評估亦有別於一般暴力案件，跟騷案件風險評估所使用的方法沒有計算出精確的風險數字，而是採用結構化專業評估（Structured Professional Judgment, SPJ）工具。本類評估工具的使用，必須由有經驗者檢視各種風險因素並評估其與後續暴力行為的相關性，透過個別案件分析並據以制定被害人後續的安全計畫。結構化專業判斷方法，係整合精算方法的優勢以及將特定個案的臨床判斷相結合（Coupland, 2018）。迄今為止，國外已經設計數種專門評估跟騷者

暴力風險的評估工具或措施。有一些工具的適用對象很全面，適合所有專業人員共同使用，而有一些則是專門針對第一線警察所設計的工具。茲簡介常見的工具。

(一) 跟騷評估和管理指南 (The Guidelines for Stalk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SAM)

第一個制定跟騷風險評估與管理工具的研究團隊，是由加拿大的 Kropp、Hart 和 Lyon (2008) 等人所制定的風險評估工具：《跟騷評估和管理指南》(Guidelines for Stalk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SAM)，該指南是專門開發給精神科醫生以及刑事司法工作者使用。對 SAM 進行的初步研究顯示，與已經開發使用的暴力傾向評估，如：《精神疾病篩選表》(Psychopathy Checklist Screening Version, PCL: SV) 和《暴力風險評估指南》(Violence Risk Appraisal Guide, VRAG) 相比，該工具具有良好的效度。SAM 所評估的關鍵領域包括：1. 跟騷行為的性質：係由跟騷行為模式相關的項目組成，旨在協助辨識跟騷行為的嚴重性；2. 跟騷者的危險因素：旨在辨識跟騷者的心理社會適應和背景，並提供與從事跟騷行為動機有關的跟騷者特徵；3. 被害人脆弱性因素：包含評估被害人心理社會適應和背景的項目，這些特徵可能會影響被害人自我保護能力。在每個領域中，均包含 10 個項目，總計 30 個項目(參閱表 1)。除這些因素外，鑑於跟騷行為多樣性，Kropp 等人讓評估工具的使用保持靈活性。因此，在特定的跟騷情況下，尚需要合併考慮其他因素(Racine & Billick, 2014)。

評估人員必須根據「最近」和「過去」二個不同時間階段進行兩組評分，「最近」的評分係反映跟騷案件的當前行為，而「過去」則是指案件評估前所發生的任何行為。根據簡易風險判斷，要求使用者評估跟騷者繼續跟騷的風險、被害人遭受嚴重身體傷害的風險，以及被害人恐懼的合理性，從而決定是否需要採取立即行動以及案件處理優先順序。其中，案件處理優先順序旨在反映「防止跟騷者行為需要付出的努力或干預的程度」(Kropp, Hart, & Lyon, 2008)。

截至目前為止，已有多項研究針對 SAM 的準確性進行評估研究 (Shea, McEwan, Strand, & Ogloff, 2018; Foellmi, Rosenfeld, & Galiotta, 2016; Kropp et al., 2011; Storey & Hart, 2011; Belfrage & Strand, 2009; Storey, Hart, Meloy, & Reavis, 2009)。在 SAM 的初步驗證中，Kropp 等人 (2011) 使用中位數校正項目與總項目的相關性，發現：單個項目 (N、P 和 V 因子) 與總分之間存在適度的相關性，顯示每個風險因子都可以為風險評估提供獨立且獨特的訊息。他們也發現：總評分具有良好的跨域可靠性 (ICC1=.82)，而「摘要風

險」評估具有中等至良好的跨域可靠性 (ICC1 範圍為 0.39 至 0.71)。Belfrage 和 Strand (2009) 以瑞典兩個警察局所受理的 189 案件，並使用 SAM 進行評估次數計 230 次，研究發現：被評定為當前風險因素的數量與風險摘要判斷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就 SAM 與警察評估的風險程度之間的相關性而言，具有良好效度。尤其是被害人易受傷害的因素越多，警察對該案評估的風險值就越高。最後，Storey 等人 (2009) 以特定精神疾病患者為對象，使用 SAM 進行評估，亦發現有良好的效度。

表 1 跟騷評估和管理準則 (SAM) 的評估項目

跟騷行為的性質	跟騷者的危險因素	被害人脆弱性因
N1 有關被害人訊息的交流方式	P1 憤怒情緒	V1 對跟騷者行為不一致
N2 與被害人溝通方式	P2 痴迷	V2 對跟騷者態度不一致
N3 接近被害人的方式	P3 不理性	V3 獲取資源的能力不足
N4 是否與被害人直接接觸	P4 沒有悔意	V4 不安全的生活狀況
N5 恐嚇被害人的情形	P5 反社會的生活型態	V5 存在家屬照顧問題
N6 對被害人的威脅方式	P6 存在親密關係衝突	V6 存在親密關係衝突
N7 對被害人施暴的情形	P7 非親密關係問題	V7 非親密關係問題
N8 跟騷行為是否持續存在	P8 哀傷情緒	V8 哀傷情緒
N9 跟騷行為是否有升級	P9 物質成癮問題	V9 物質成癮問題
N10 是否違反保護令 (或限制令) 而持續跟騷	P10 就業不穩定和財務問題	V10 就業不穩定和財務問題

資料來源：Coupland, S. H. (2018). *Stalking and Violence: A 10-year Follow-Up of Stalking Offenders*, p.6..

但本工具並非沒有缺點。Shea 等人 (2018) 使用過去和最近的評分等級檢查 SAM 的評分穩定性，結果發現，由於每一件跟騷案件的延續期間不同 (有些可能只有數週，有些可能長達數年)，因此有關「過去」和「最近」時間段的定義是有問題的。具體而言，SAM 手冊指出：「『最近』的時間範圍是從『跟騷者首先進行的行為到導致被害人出現擔憂或恐懼感，並且或多或少持續到現在為止』」，但在 Shea 等人 (2018) 的研究案例中，跟騷行為持續期間不同，甚至有長達 20 年者，儘管採行的騷擾行為方式有所變化，但跟騷強度並未減弱，因此他們認為，應該比照其他結構化專業評估工具，使用固定時間段才能更精確地評估風險狀態的波動。當 Shea 等人 (2018) 將「最近時間段」重新定義為「最近六個月內的時間」後發現，摘要風險判斷具

有中度的可靠性 ($ICC1=.50-.77$)。其次, McEwan、Harder、Brandt 和 de Vogel (2020) 的研究則指出, 儘管 SAM 風險判斷可以有效預測同一被害人是否會持續遭到跟騷, 但卻無法用於評估跟騷者是否會跟騷其他被害人。

(二) 跟騷風險剖繪 (Stalking Risk Profile, SRP)

另一項工具是由澳洲學者 Mackenzie 等人 (2009) 所建構的《跟騷風險剖繪》(Stalking Risk Profile, SRP), 亦專門用於評估跟騷案件的風險, 是一套結構化的專業判斷指南。SRP 使用 Mullen 類型學為框架, 評估跟騷行為的風險因素, 其內容由五個關鍵領域所構成: 1. 跟騷者與被害人之間關係的性質; 2. 跟騷者的動機; 3. 跟騷者的心理、精神狀態和人際關係; 4. 被害人的社會和心理脆弱性; 5. 發生跟騷行為的法律和心理健康情況。本評估工具內容包含動態評估指標, 讓評估者可以考慮在跟騷情況下產生暴力行為的可能性, 並評估可能的危害程度 (Racine & Billick, 2014; McEwan, Pathe, & Ogloff, 2011)。SRP 總共有 81 個風險因素, 評估時會依照被評估者適合的類別或動機類型, 分別使用五個領域的風險因素, 在使用上有以下三項特色: 1. SRP 不僅要求評估人員須對每個風險領域進行個別風險判斷, 還要提供與再犯和暴力風險相關的靜態與動態情境風險因素的單獨組合。2. SRP 確認可能對跟騷者造成心理社會損害的需求領域, 係與跨領域風險增加有關。3. SRP 強調: 並非所有跟騷者都有共同的動機, 而且具有不同動機的跟騷者具有不同的個人特質, 以及暴力攻擊風險因素 (McEwan, Pathe, & Ogloff, 2011)。因此, 評估人員在進行案件風險評估前必須先確認跟騷者的類型, 再評估跟騷者的風險範圍, 每個案例的評分為 32 至 40 個項目 (McEwan et al., 2016)。

有關 SRP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檢測方面, 根據 McEwan 等人 (2016) 的評估研究結果發現⁴, SRP 對跟騷類型進行分類時具有非常高的信度 ($Kappa=.98$), 並且對於整體風險評估具有中等以上的信度 (對同一被害人再次跟騷的預測一致性介於 0.70 到 0.90)。在預測有效性方面, McEwan 等人 (2016) 在追訪的前半年根據綜合評分結果, 發現: 當跟騷者被評估為高再犯風險者, 則其實際再犯率將較被評估為低風險者要高出許多; 而關於長期的追訪結果研究亦發現, 基於對相同被害人的持續性和復發性, 低風險組比高風險組犯下新的跟騷行為可能性要小得多。整體而言, McEwan 等人 (2016) 研究結果指出: SRP 在較長的追訪期, 比在短期追訪期內更能對跟騷者進行有效區分, 長期追訪具有相對較好的再測信度和良好的內部一

⁴ 本研究以 241 名男性跟騷者為樣本, 歷時 5 年的時間, 使用警察和心理健康中心的資料, 追蹤他們後續是否持續跟騷行為或其他暴力累犯行為 (McEwan et al., 2016)。

致性。但另一方面，McEwan 等人(2018)對 SRP 是否能有效預測跟騷者對其他被害人實施跟騷行為的預測有效性進行評估，研究結果發現，雖然 SRP 能有效預測同一被害人未來持續遭受跟騷的風險，但不能有效預測跟騷者是否會對另一被害人實施跟騷行為。

(三) 篩選評估 (Screening Measures)

除了前述全面性的風險評估工具外，目前還有許多篩選評估工具可用於跟騷案件初步風險評估，但其準確性則多未經評估。其中，McEwan, Strand、MacKenzie 和 James (2015) 編制《跟蹤和騷擾篩選評估》(Screening Assessment for Stalking and Harassment, SASH) 即屬此類評估工具。本工具旨在為第一線處理跟騷案件的警察提供指導決策，他們在收到被害人的報案時，往往欠缺全面的案件訊息。作者特別強調，本工具並不是設計作為風險評估的工具，而是設計為篩選工具或案件分類措施。由於該工具旨在提供第一線警察人員使用，因此該工具內容讓警察可以容易掌握風險因素(例如，可觀察到的行為)，不需要具備對風險因素有非常專業的知識。本工具由 16 個項目組成，涵蓋三個主要領域：1. 跟騷行為；2. 跟騷的靜態風險因素；和 3. 被害人的處境。在對這 16 個項目進行評估後，評估者會根據標記為存在的項目數量和性質對案件需要關注的水平(低/中/高)做出總體判斷。若被評估為需要高度關注的案件，則搭配 SAM 或 SRP 等工具的使用，進行更全面的風險評估 (McEwan et al., 2015)。

Hehemann 等人(2017)以荷蘭警察受理跟騷案件使用《跟蹤和騷擾篩選評估》(SASH)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進行首次評估。本研究檢視荷蘭警察所處理的 115 件跟騷案件評分情形，並進行為期 6 個月的追蹤。研究結果顯示，本工具能有效區分跟騷案件後續應該關注的程度(低、中或高關注度)，而有助於跟騷案件後續暴力風險評估。同時，評估者之間的可靠性分析顯示，縱然未經培訓的警察評估準確度達 80%，而若是通過適當培訓的警察使用本工具則可進一步使用跟騷行為的結構化評估工具，可確保警察適當處理跟騷案件並制定案件後續風險管理與執法策略。

綜合前述文獻，可以將跟騷者暴力風險評估工具及其類型整理如表 2 所示。同時，對跟騷案件風險評估有以下幾點啟發：(一)由於誘發因素和動態情境因素會共同影響暴力風險，因此在進行跟騷案件風險評估時，應該將誘發因素和動態情境風險因素都包括在評估工作中，而前述的風險評估工具，如跟騷風險剖繪 (SRP) (McEwan et al., 2018) 以及跟騷評估和管理指南 (SAM) (Kropp et al., 2011) 也都是依此原則而建構並用於實務操作中。而且由於暴力風險根據動態背景因素而波動，因此風險評估需要掌握動態因

素並定期重新評估，例如，McEwan (2018) 等人的研究建議，至少每隔 4-6 個月進行一次評估。(二) 無論評估的風險程度為何，由於暴力風險可能會因不可預測的動態風險因素(例如觸發事件)而迅速變化，因此需要讓被害人了解潛在的風險情況，如何面對可能的情況以及應採取哪些策略來預防衝突的升級。而在跟騷評估和管理指南(SAM)中，所採用的情境規劃方法即是為被害人提供安全計畫的參考策略(Kropp et al., 2011)。

表 2 跟騷者暴力風險評估工具及其類型

評估工具類型	常用評估工具範例	評估工具適用範圍
全面性風險評估工具	《跟騷評估和管理指南》(SAM)	可以對案件進行詳細風險評估，但需要案件詳細訊息，且需具備跟騷風險評估專業能力。
	《跟騷風險剖繪》(SRP)	可以對案件進行詳細風險評估，但需要案件詳細訊息，且需具備跟騷風險評估專業能力。
案件篩選評估工具	《跟蹤和騷擾篩選評估》(SASH)	讓第一線受理案件警察方便對跟騷案件進行初步篩選，後端案件管理人員需進行案件全面風險評估。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伍、結論與建議

雖然立法至關重要，但如果沒有明確的跟騷行為防制政策和有效的執法策略，法律就無法實現保護被害人的目的(Herman & Markon, 2017)。單獨看個別跟騷行為可能不覺有害，但如果是跟騷者反覆強加給被害人不受歡迎的行為模式，就另當別論。無論是與親密關係暴力有關，還是涉及熟人或陌生人的跟騷行為，即使是沒有任何公然威脅傷害被害人的情況，但在某些動態情境因素的促發下，跟騷行為仍可能會具有暴力危險性，而導致被害人嚴重傷害，甚至致命。由於跟騷行為是非常普遍現象，介入前須先確認哪些跟騷者最有可能再次騷擾被害人，並指引風險管理以減少發生危害的可能性。要實現這兩個目標，就必須能有效預測跟騷行為的風險因素。但另一方面，由於跟騷行為的本質，導致預測跟騷者再犯行為，比預測其他暴力類型更為複雜(McEwan et al., 2020; Kropp, Hart, & Lyon, 2002)。同時，由於跟

騷案件中暴力發生風險是動態的，應進行相應的評估並同時考慮多個風險因素，將誘發因素和情境風險因素結合在一起，才能更準確地評估風險。而在對跟騷行為進行風險評估時，評估工具應包括：跟騷者風險因素，被害人弱點因素，以及風險管理（尤其是結果）策略（Belfrage & Strand, 2009）。SAM 和 SRP 等風險評估工具都強調：某些被害人因素在風險評估中的作用，包括：對跟騷者的態度不一致或不明確的反應，以及正在進行子女監護權訴訟等，均是風險評估時必須特別注意的觸發因素（McEwan, Pathe, & Ogloff, 2011）。而 Spitzberg（2002）的研究也強調，被害人在面對他們的處境時經常會陷入困境，甚至被害人採取的行動有時反而會對跟騷行為產生負面影響（如，聯繫跟騷者，讓他們接觸自己）。因此，在法益保護原則下，跟騷案件執法策略除必須定時對跟騷者暴力風險進行評估，實施適切的監控和/或處遇，亦必須有專人與被害人討論其安全計畫，方能有效降低暴力危害。

誠如 Dutton 和 Kropp（2000）所言，評估工具之建構只是一個起步，更重要的是必須能用於風險判斷，因此風險評估方式以及後續執法策略就變得非常重要。而國外研究亦顯示，現有風險評估工具的預測準確度並非百分之百，無法單純仰賴工具進行風險評估，還必須搭配使用其他評估方法，而最常搭配的方式則是仰賴專業人員判斷，故在評估模式上常採行整合性的風險分級評估模式（Kropp, 2004）。同理，就跟騷者暴力行為之預防而言，風險評估工具之建構只是其中一環，更重要的是必須能夠做為後續「監控」與「處遇」計畫執行的參考，方能真正有效降低跟騷者的再犯/暴力風險。而欲達成此目的，除必須建立系統化的個案管理機制、整理動態風險評估資料，也需要建構社區實務網絡團隊進行「動態風險評估」與安全控管。而觀察各國執法困境與效益亦可發現：跟騷案件證據收集不易；對部分跟騷者難以發揮法律的威嚇效果；警察若是孤立的執法將難發揮立法效益；對被害人保護不能僅依賴公權力介入，尚須提供其他保護措施。顯示若無完善的執法策略，將嚴重阻礙防制效果（黃翠紋，2019）。

綜上，由於跟騷案件的獨特性以及對被害人人身安全存在巨大潛在威脅，無法經由傳統警察作為達到保護被害人人身安全目標，必須採取早期干預、預防性行動和積極解決問題的策略。除警察機關內部必須要有專門的調查人員與案件管理人員外，也必須積極與社區中其他公私部門合作，採用跨網絡合作方式建構安全防護網，經由與社政、衛政、教育、檢察官、社區民間部門（如守望相助隊、社區發展協會等），甚至矯正機關的合作，就嚴重的跟騷案件予以列管，並定期檢視案件處理的成效。在臺灣，迄今並無本土實證研究針對跟騷者進行分類，亦無研究針對跟騷案件的暴力風險進行研析。在內政部警政署函發「警察機關防制跟蹤騷擾案件實施計畫」後，已針

對警察所受理的跟騷案件進行列管，未來應有研究針對這些案件進行詳細分析，從而瞭解臺灣社會的跟騷者類型，方能進一步瞭解不同類型跟騷者的比率及其危險性，從而建構適合臺灣的跟騷者風險評估工具。而就執法策略而言，由於臺灣從 2009 年即開始推動「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實施計畫」並獲得不錯成效，頗值得未來在處理此類案件的參考。從國外的調查顯示，至少有半數的跟騷案件是發生在二造關係為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者，因此若屬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應該可以納入各縣市每月定期舉辦的高危機網絡會議中，針對案件的處理情形進行討論，並由保護性業務社工與被害人研討安全計畫；但若非屬親密關係暴力案件者，則應該研議可行的被害人安全防護網實施模式，方能有效降低被害人的潛在暴力風險。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沈勝昂(2006)。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再犯危險評估量表之建立—動態危險因素之探測(三)。內政部委託研究。
- 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2010)。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
- 陳慈幸(2011)。司法改革的另一思考--從日本纏擾(Stalker)防治法談起。司法新聲季刊，97，頁78-104。
- 黃翠紋(2013)。婦幼安全政策分析，臺北：五南圖書。
- 黃翠紋(2018)。無處容身—談跟蹤騷擾防制之立法與展望，刑事雙月刊，86，頁7-12。
- 黃翠紋(2019)。跟蹤騷擾防制法之評析與展望。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2，頁255-292。
- 黃翠紋、孟維德(2016)。警察與犯罪預防。臺北：五南圖書。
- 楊綿傑(2019)。婦團調查：24%國人曾遭科技跟監 女性佔近8成，https://www.38.org.tw/news_detail.asp，搜尋日期：2019/08/21。

外文文獻

- Baum, K, Catalano, S, Rand, M & Rose, K (2009). *Stalking Victimis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Available from <http://www.ovw.usdoj.gov>. (Accessed: 10 April 2018).
- Belfrage, H. & Strand, S. (2009). Validation of the Stalk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checklist (SAM) in law enforcement: a prospective study of 153 cases of stalking in two Swedish police coun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11 (1), 67-76.
- Black, M. C., Basile, K. C., Breiding, M. J., Smith, S. G., Walters, M. L., Merrick, M. T., Stevens, M. R. (2011). The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NISVS): 2010 summary report. Atlanta, GA: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s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 Carr, M., Goranson, A., & Drummond, D. (2014). Stalking of the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Reducing risk and managing stalking behavior by patients. *Journal of Threat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1, 4-22.

- Carter, T. B. (2016). Local, State, and Federal Responses to Stalking: Are Anti-Stalking Laws Effective. *William & Mary Journal of Women and the Law*, 22 (2), 333-391.
- Casey, S., Day, A., Vess, J., & Ward, T. (2013). *Foundations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Routledg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OX14 4RN 119-120.
- Churcher, F. P. & Nesca, M. (2013). Risk Factors for Violence in Stalking Perpetration: A Meta-Analysis. *FWU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7 (2), 100-112.
- Coupland, S. H. (2018). *Stalking and Violence: A 10-year Follow-Up of Stalking Offende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 Craig, L. A., Beech, A. R., & Harkins, L. (2009). The predictive accuracy of risk actors and frameworks. In A. R. Beech, L. A. Craig, & K. D. Browne (Eds.),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Sex Offenders: A handbook*, (pp.53-74).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Ltd.
- David, M. N. F. (2018). The neo-criminalization of stalking in the Portuguese legal system. *Journal of Forensic and Legal Medicine*, 58, 199-204.
- Dietz, N. A., & Martin, P. Y. (2007). Woman who are stalked: Questioning the fear standar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3, 750-776.
- Douglas, K. S. & Kropp, P. R. (2002). A prevention-based paradigm for violence risk assessment: Clinical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9 (5), 617-658.
- Douglas, K.S, Hart S.D, Webster, C. D, Belfrage, H, Guy L.S & Wilson, C.M (2015) Historical-Clinical-Risk Management-20, Version 3 (HCR-20V3): Development and Overview.
- Dutton, D.G., & Kropp, M. (2000). Violence risk prediction: Clinical and actuarial measures and the role of psychopath checklist.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77 (4), 303-311.
- Foellmi, M.C., Rosenfeld, B., & Galietta, M. (2016). Assessing risk for recidivism in individuals convicted of stalking offenses: Predictive validity of the Guidelines for Stalk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3 (5), 600-616.
- Fox, K. A., Nobles, M. R., & Fisher, B. S. (2011). Method behind the madness: An examination of stalking measurement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6 (1), 74-84.

- Hanson, R. K., Harris, A. J. R., Scott, T., & Helmus, L. (2007). *Assessing the risk of sexual offenders on community supervision: The Dynamic Supervision Project*. User Report, Corrections Research. Ottawa, Canada: Public Safety Canada.
- Harris, A. J. R., & Hanson, R. K. (2010). Clinical, actuarial and dynamic risk assessment of sexual offenders: Why do things change? *Journal of Sexual Aggression*, 16 (3), 296-310.
- Hart, S. D., Kropp, P. R., Laws, D. R., Klaver, J., Logan, C., & Watt, K. A. (2003). The Risk for Sexual Violence Protocol (RSVP): Structured professional guidelines for assessing risk of sexual violence. Vancouver: BC: The British Columbia Institute Against Family Violence.
- Hehemann, K., van Nobelen, D., Brandt, C., & McEwan, T. (2017). The reliability and predictive validity of the Screening Assessment for Stalking and Harassment (SASH). *Journal of Threat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4 (3), 164-177.
- Herman, S. & Markon, M. (2017). Problem-Oriented Guides for Police Problem-Specific Guides Serie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 Holmes, R. M. (2001). Criminal stalking: An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typologies of stalking. In J. A. Davis (Ed.), *Stalking crimes and victim protection* (pp. 132–160).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 Jackson, R. L., & Hess, D. T. (2007). Evaluation for civil commitment of sex offenders: A survey of experts. *Sexual Abuse: A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19, 409-448.
- James, N. (2015). Risk and Needs Assessment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Kienlen, K. K., Birmingham, D. L., Solberg, K. B., O'reagan, J. T., & Meloy, J. R. (1997).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sychotic and non-psychotic stalk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25, 317–34.
- Kropp, P. R. & Hart, S. D. (2000). The Spousal Assault Risk Assessment (SARA) Guid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adult male offender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4 (1), 101–118.
- Kropp, P. R. (2004).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spousal assault risk assessmen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0 (6), 676-697.
- Kropp, P. R., & Cook, A. N. (2014).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talking, and

- femicide. In J. R. Meloy & J. Hoffman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reat Assessment* (pp. 178-1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opp, P. R., Hart, S. D., & Lyon, D. R. (2002). Risk assessment of stalkers: Some problem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9 (5), 590-616.
- Kropp, P. R., Hart, S. D., & Lyon, D. R., & Storey, J. E. (2011).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guidelines for stalk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Behavior of Sciences of the Law*, 29, 302–316.
- Kropp, P. R., Hart, S. D., & Lyon, D.R. (2008). *Guidelines for stalk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SAM)user manual*. Vancouver, Canada: Pro Active ReSolutions Inc.
- Kuehner, C., Gass, P., & Dressing, H. (2007). Increased risk of mental disorders among lifetime victims of stalking—Findings from a community study. *European Psychiatry*, 22, 142-145.
- Logan, T. (2010). Research on partner stalking: Putting the pieces together.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Department of Behavioral Science & Center on Drug and Alcohol Research. Retrieved from www.cdar.uky.edu/vaw. (accessed on 27 Feb 2019)
- Logan, T. K., & Walker, R. (2017). Stalking: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 and safety planning.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8, 200-222.
- Logan, T., Cole, J., Shannon, L., & Walker, R. (2006). *Partner stalking: How women respond, cope, and survive*. New York: Springer.
- Mackenzie, R. D., McEwan, T. E., Pathe, M. T., James, D. V., Ogloff, J. R. P., Mullen, P. E. (2009). *Stalking risk profile: guidelines for assessing and managing stalkers*. Melbourne, Australia: StalkInc & Centre for Forensic behavioral Science.
- Malsch, M., de Keijser, J., & Debets, S. (2011). Are stalkers recidivists? Repeated offending by convicted stalkers. *Violence and Victims*, 26, 3-15.
- McEwan, T. E., Daffern, M., MacKenzie, R. D., & Ogloff, J. R. P. (2017). Risk factors for stalking violence, persistence, and recurrence. *The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 Psychology*, 28, 38-56.
- McEwan, T. E., Harder, L., Brandt, C. & de Vogel, V. (2020). Risk factors for stalking recidivism in a Dutch community forensic mental health samp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nsic Mental Health*, 19 (2), 127-141.
- McEwan, T. E., MacKenzie, R. D., Mullen, P. E., & James, D. V. (2012). Approach

- and escalation in stalking. *The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 Psychology*, 23, 392-409.
- McEwan, T. E., Mullen, P. E., MacKenzie, R. D., & Ogloff, J. R. P. (2009). Violence in stalking situation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39, 1469-1478.
- McEwan, T. E., Pathe, M., & Ogloff, J. R.P. (2011). Advances in stalking risk assessment. *Behavior of Sciences of the Law*, 29, 180-201.
- McEwan, T. E., Shea, D. E., Daffern, M., MacKenzie, R. D., Ogloff, J. R., & Mullen, P. E. (2018). The reliability and predictive validity of the Stalking Risk Profile. *Assessment*, 25, 259-276.
- McEwan, T. E., Shea, D. E., Daffern, M., MacKenzie, R. D., Ogloff, J. R. P., & Mullen, P. E. (2018). The reliability and predictive validity of the stalking risk profile. *Assessment*, 25 (2), 259-276.
- McEwan, T. E., Shea, D. E., Daffern, M., MacKenzie, R., Ogloff, J. R. P., & Mullen, P. E. (2016). The reliability and predictive validity of the stalking risk profile. *Assessment*, 1-18.
- McEwan, T. E., Strand, S., MacKenzie, R. D., & James, D. V. (2015). *Screening assessment for stalking and harassment (SASH)*. Retrieved from 94 <https://www.stalkingriskprofile.com/stalking-risk-profile/stalking-assessment-screen>.
- McFarlane, J. M., Campbell, J. G., Wilt, S., & Sachs, C. (1999). Stalking and intimate partner femicide. *Homicide Studies*, 3 (4), 300-316.
- Melton, H. C. (2007). Stalking in the context of intimate partner abuse: In the victims' words. *Feminist Criminology*, 2 (4): 347-363.
- Miller, L. (2012). Stalking: Patterns, motive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7, 495-506.
- Mohandie, K., Meloy, J. R., McGowan, M. G., & Williams, J. (2006). The RECON typology of stalki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based upon a large sample of North American stalker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 51, 147-155.
- Mullen, P. E., Mackenzie, R., Ogloff, J. R. P., Pathe, M., McEwan, T., & Purcell, R. (2006). Assessing and managing the risks in the stalking situatio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34, 439-450.
- Mullen, P. E., Pathé, M., & Purcell, R. (2001). Stalking: New constructions of human behaviour.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 9-16.

- Mullen, P. E., Pathé, M., & Purcell, R. (2009). *Stalkers and Their Victims*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llen, P. E., Pathe, M., Purcell, R., & Stuart, G.W. (1999). Study of stal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6, 1244-1249.
- Mumm, S. S., & Cupach, W. (2010). Turning points in the progression of obsessive relational intrusion and stalking. *Violence and Victims*, 25, 707-727.
- 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2007). *The model stalking code revisited: Responding to the new realities of stalking*.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ssociation. (1993). *Project to develop a model anti-stalking code for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 Nicol, B. (2006). *Stalking*. London, England: Reaktion Books Ltd.
-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6). Chapter 4: *Violent Crime and Sexual Offences: Intimate personal violence and partner abuse*. Available at: www.ons.gov.uk (Accessed: 10 April 2018).
- Racine, C., M., & Billick, S. (2014). Classification Systems for Stalking Behavior.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 59 (1), 250-254.
- Rosenfeld, B. (2003). Recidivism in stalking and obsessional harassmen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7 (3), 251-265.
- Schlesinger, L. B. (2006). Celebrity Stalking, Homicide, and Suicide: A Psychological Autops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0 (1), 39-46.
- Shea, D., McEwan, T. E., Ogloff, J. P. E. (2018) The reliability and predictive validity of the Guidelines for Stalk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SAM).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30 (11), 1409-1420.
- Sheridan, L. & Davies, G. M. (2001). Violence and the prior victim–stalker relationship. *Criminal Behaviour and Mental Health*, 11 (2), 102-116 .
- Sheridan, L. P., & Boon, J. (2002). Stalker typ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law enforcement. In J. Boone, & L. Sheridan (Eds.), *Stalking and psychological obsessio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prevention, policing, and treatment* (pp. 63–82). Chichester, UK: Wiley.
- Sheridan, L., & Lyndon, A. (2012). The influence of prior relationship, gender, and fear on the consequences of stalking victimization. *Sex Roles*, 66, 340–

350.

- Spitzberg, B. H. (2002). In the shadow of the stalker: the problem of policing unwanted pursuit. In H. Giles (Ed.), *Law enforce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pp. 173–200).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Spitzberg, B. H., & Cupach, W. R. (2007).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stalking: Taking stock of the emerging literature.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2*, 64-86.
- Spitzberg, B. H., & Cupach, W. R. (2014). *The dark side of pursuit: From attraction to obsession and stalking* (2nd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talking Resource Center (2018). Analyzing Stalking Laws <http://victimsofcrime.org/docs/src/analyzing-stalking-statute.pdf?sfvrsn=2> (accessed on 27 Feb 2019)
- Storey, J. E., & Hart, S. D. (2011). How do police respond to stalk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actics used in a specialized anti-stalking law enforcement unit. *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26* (2), 128-142.
- Storey, J. E., Hart, S. D., Meloy, J. R., & Reavis, J. A. (2009). Psychopathy and stalking. *Law and Human Behavior, 33*, 237-246.
- Sutherland, A. A., Johnstone, L., Davidson, K. M., Hart, S. D., Cooke, D. J., P. et al. (2012) Sexual violence risk assess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of professional judgments made using the risk for sexual violence protoc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nsic Mental Health, 11* (2), 119-133.
- Taylor, M. & Quayle, E. (2003). *Child Pornography: An Internet Crime*. Hove: Brunner-Routledge.
- Thompson, C. M., Dennison, S. M., & Stewart, A. (2013). Are differe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stalking violence? Examining factors from the integrated theoretical model of stalking violence.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0*, 850-880.
- Tjaden, P., & Thoennes, N. (1997). *Stalking in America: fi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rvey*. Denver, CO: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 Tjaden, P. (2009). Stalking policies and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 twenty year retro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al Policy Research, 15*, 261-278.
- van der Aa, S. (2018). New Trends in the Criminalization of Stalking in the EU

- Member States.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24 (3), 315-333.
- van der Aa, S., & Römken, R. (2013).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stalking legislation: Reflections on European developments. *European Criminal Law Review*, 3 (2), 232-256.
- Zona, M. A., Sharma, K. K., & Lane, J. C. (199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rotomatic and obsessional subjects in a forensic sample.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 38, 894-903.